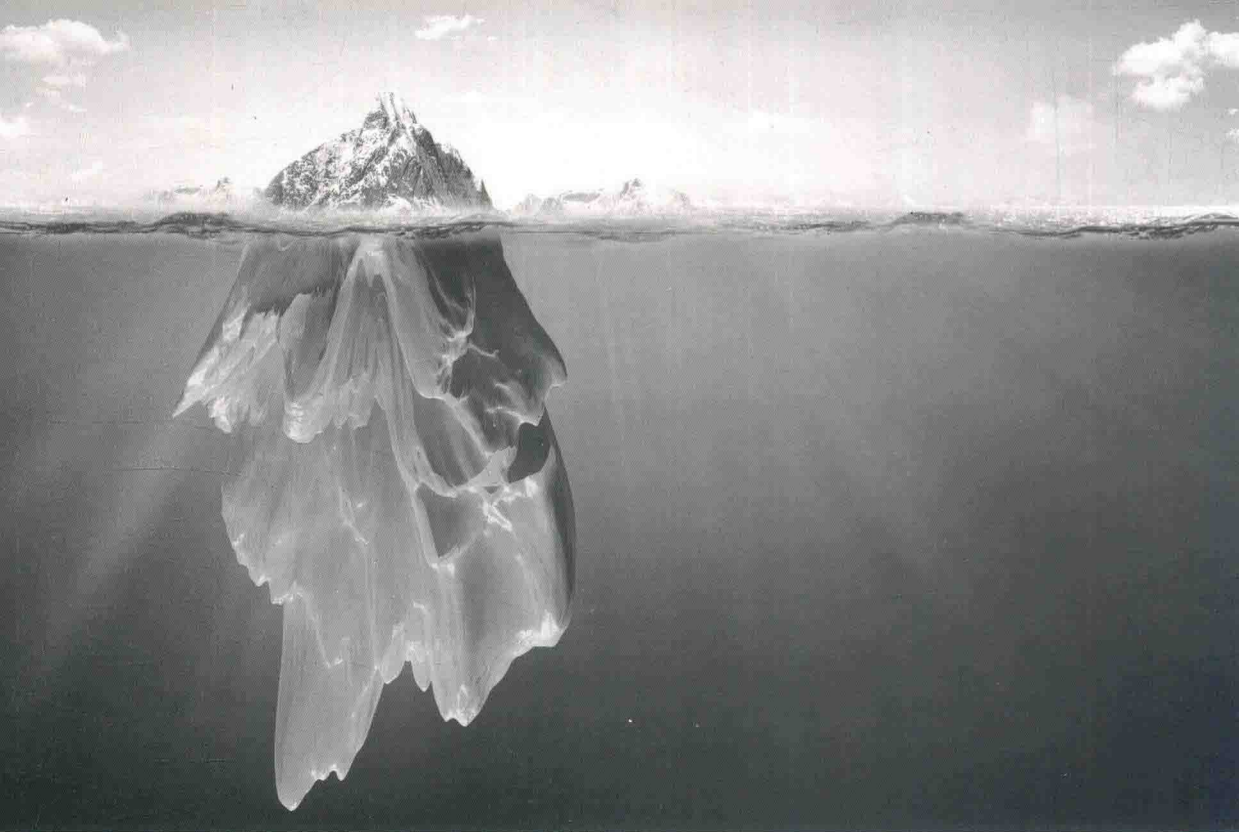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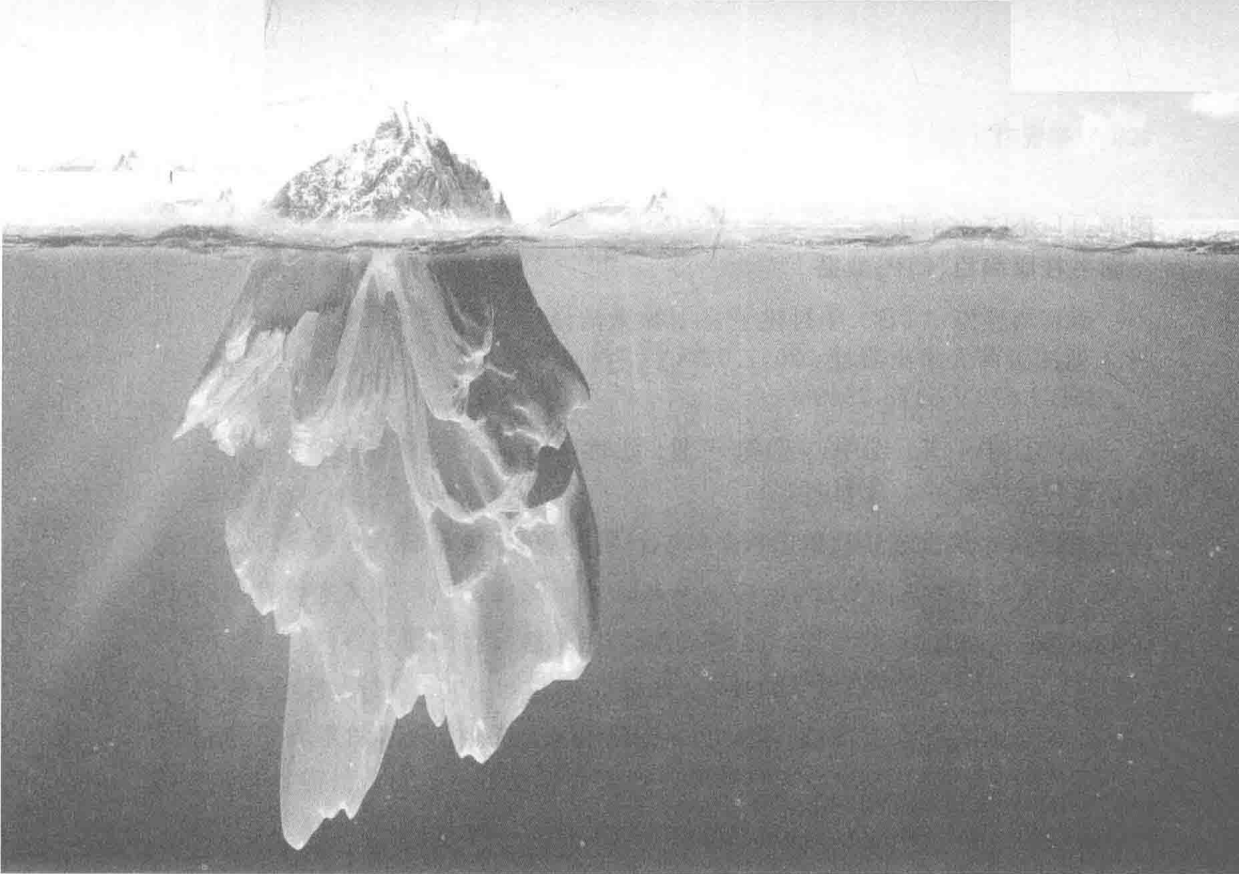
语言 与 性别

ことばとジェンダー

[日]中村桃子 著 徐微洁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语言 与 性别

ことばとジェンダー

[日]中村桃子 著 徐微洁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字:11-2017-3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性别 / (日) 中村桃子著; 徐微洁译.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78-2549-4

I. ①语… II. ①中… ②徐… III. ①性别差异—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3075 号

KOTOBA TO GENDER

by NAKAMURA Momoko

Copyright ©2001 NAKAMURA Momo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EISO SHOBO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EISO SHOBO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语言与性别

[日]中村桃子 著 徐微洁 译

责任编辑 姚媛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96千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2549-4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作者序

此次,承蒙浙江师范大学徐微洁老师费心尽力,各位读者才得以用汉语阅读拙著《语言与性别》。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有幸,本书在日本也已再版,读者众多。我希望,在汉语圈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语言与性别的密切关系感兴趣。

《语言与性别》是2001年付梓出版的,书中只收集了2001年之前的研究。因此,在中译本的序言中,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本领域2001年之后的发展情况。各位读者在通读本书之后,如果能再阅读这篇序,势必会对本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本书强调以下四点,这四点现在在语言与性别研究领域也广为学者所接受。

1.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认同的知识和各种身份并非事先存在的,而是历史、社会性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通过使用语言,表达不同场合中的多样身份。之前的语言与性别研究认为,说话者首先具有“女人味”或“男人气概”,说话者使用特定措辞是“因为是女人”或“因为是男人”。但是,如果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那么就是说话者通过使用特定的措辞来表达各种“女人味”或“男人气概”。

2. 多样的性别身份

性别不仅因时代、社会、文化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即便是同一时代的相同地区,也会由于人种、年龄、职业、性取向等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而表现出多样的“女人味”和“男人气概”。性别学认为,“如果不考虑性别,就无法解释社会现象;如果仅用性别,也无法解释社会现象”。在思考语言与性别的问题时,不应基于男女两性一分为二地考虑“语言的性别差异”,而应考虑因各种因素而引发变化的“女人味”和“男人气概”。

3. 语言形式的含义

特定语言形式的作用并非事先决定的,而是由于使用情况的不同而彼此存

在差异。被认为与“女人味”和“男人气概”相结合的人称代词〔“あたし(我, atashi, 女性第一人称代词)”和“ぼく(我, boku, 男性第一人称代词)”〕及文末助词〔“ワ(wa, 女性文末助词)”和“ゼ(ze, 男性文末助词)”〕等语言形式许多时候也发挥着与性别无关的作用。本书第五章提及的奥克斯认为, 日语的文末助词“ワ(wa)”和“ゼ(ze)”直接标引“柔らかさ(柔和)”和“荒々しさ(粗暴)”这种社会含义(立场、言语行为、活动的种类等), 以这些社会含义为媒介可以间接读取性别(Ochs, 1992)。因此, 要想确定语言形式的含义, 有必要详细分析该语言形式的具体使用情况。

4.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这个词语有各种意思, 但在“语言与性别”中, 我们只选取了“性别意识形态”与“语言意识形态”。前者是指在被广为认可的观念中与性别相关的“知识、常识”; 我们将什么作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不明言, 以及以什么为前提解释对方的发言与之息息相关。后者是指, 在大家广为认同的观点中与语言相关的内容, 特别是与标准语和非标准语这种语言变异的形成与阶层化相关的内容。如同《语言与性别》中所阐述的, 无论哪种意识形态, 都在话语中被正当化, 同时依据话语发生变化。

2001年之后的语言与性别研究不仅反映了上述四大观点, 还表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1. 从“语言形式与身份”到“语体(style)与人物角色(persona)”

自古以来, 人称代词与文末助词等语言形式被认为直接与身份相结合。但是,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人们发现说话者通过组合几种语言形式或利用语言之外的要素也能表达细微不同的身份。比如, 根据埃克特的调查, 在美国高中, 特定的措辞和服装与同一所高中不同的团体相结合, 而且这种结合的利用方式不同, 男女同学的个人和场合都会不同(Eckert, 2000)。此外, 在中国北京, 外企员工通过使用与国企员工不同的语音来建构不同的身份(Zhang, 2005)。诸如此类, 包含语言和其他非语言形式的集合与某个团体内特定的身份相结合时, 这个集合被称作“语体(style)”(Coupland, 2007)。使用特定语体来表达的身份有时被称作“人物角色(persona)”(Eckert, 2012)。“人物角色”表示较为具体的人物, 比如“女(女人)”这种宏观层面的范畴, “管理職(管理层)”等有着地域文化特征的角色, 以及“聞き上手(善听)”这种在会话场合被短暂期待的角色等复数层面的范畴(Bucholtz et al., 2005)。说话者通过不同程度地利用语体和人物角色的结合, 来调整彼此的关系。

2. 作为表演(performance)的语言使用

社会建构主义的归宿之一,即我们可以作为被社会分割之外的人物出现。在《语言与性别》有关性取向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被表演的身份”这个概念。语言是让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材料之一。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无论男女,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在各种场合表演着身份。表演的语言使用最极端的表现是说话者故意使用所属团体之外的说话方式,即“语言越境(crossing)”的情况(Pampton,1995)。比如,近年出现了年轻人使用与自身家庭出身无关的方言的现象,田中(2011)将这种现象称作“方言扮装(cosplay)”。明明并非京都人,因为京都方言给人“有女人味”的印象,而故意使用“おこしやす(欢迎光临)”等京都方言。希望他人觉得自己是“有意思的人”时,使用大阪方言。自古以来,方言会被该地区无关者用来作为表演自己的材料。这也是通过语言“表演身份”的例子之一。

另一方面,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并非完全自由地使用语言,而是受到场合和角色的限制。这种限制中有敬语等被理解为礼仪和礼节的范畴。我们一边在限制和自由之间寻找平衡,一边使用着语言。对不同场合和角色说话方式的限制,有时会因性别不同而不同。比如,母亲和父亲被期待的角色不同,因此被允许的说话方式或被预想的说话方式也不同。即母亲和父亲的性别意识形态会影响说话方式的选择。

3. 从“措辞的性别差异”到“偏见、规范、评价的性别差异”

性别不过是各种身份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个事实被接受后,再将被调查者分成男女,探究其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是因为,如果人不是仅仅依据“女人味”或“男人气概”来使用语言,那么也就不可能只是为了表达“女人味”或“男人气概”来使用语言。不如说,性别差异的问题在于,“男女的说话方式是这样的”这种成见,“男女必须用这种说话方式”这种规范,以及“这种说话方式好/不好”这种对说话方式的评价。比如,对职场管理层的措辞研究表明,男女都会根据不同的场合来灵活使用所谓的“女性式”说话方式和“男性式”说话方式(Holmes,2014)。但是,采用“女性式”说话方式的女性管理层容易被认为“缺乏领导力”,采用“男性式”说话方式的女性管理层被批判为“不像个女人”(Ladegaard,2011; Olsson et al.,2004)。这表明,要研究语言与性别,应该将偏见、规范和评价作为研究对象。对说话方式的偏见、规范和评价也可作为“语言意识形态”被研究。

4. 基于“语言意识形态”的语言文体的历史研究

《语言与性别》一书在第九章提及“语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影响了之后的

研究。

将在《语言与性别》中也被提及的特定团体的说话方式(方言或语体)视为“语言意识形态”,并探究其成立历史的研究。此前,一般认为仅仅因为特定团体使用特别的说话方式就自然而然地将其说话方式视为“〇〇弁(××话/方言)”或“〇〇ことば(××用语)”。但是,该背景里有着将该团体区别于其他团体的经济、政治因素,此外,接受这些经济、政治要求建构特定语体的是有识之士或媒体。比如,认知日语的“女ことば(女性用语)”的背后,就有着在明治时期之后即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区分作为国民的女性和男性的必要性,以及昭和时期战争年代中将强制部分东亚人民使用日语正当化的目的。此外,顺守这种政治目的,国语学者的言论对“女ことば(女性用语)”的形成发挥了主要作用(Inoue, 2006; 中村, 2007; Nakamura, 2014)。女性的措辞一旦被概括为“女ことば(女性用语)”,那么偏见、规范、评价也就变本加厉了。Agha(2003)使用指代与场合、团体相结合的说话方式,即使用“语域(register)”这个术语,并将这个过程称为“语域化(enregisterment)”。

5. 基于“语言意识形态”的媒体语言研究

媒体的语言使用研究。我们之前列举的内容——无论何种相互行为都有“表演”的侧面,它使我们再次探讨对于语言研究来说什么是贴切的数据这个问题。之前的社会语言学认为,面对面进行的“自然的”会话是最贴切的数据。这个前提存在以下观点——用被调查者视作不自然的会话无法获取“真正(authentic)”的数据。在这个框架下,人们开始讨论如何减少调查者的介入,剧作家、制作人和赞助商介入的媒体会话就未曾作为数据被采集过。但是,如果无论怎样的语言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表演”的侧面,那么可以说媒体语言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数据也是贴切的。其实问题不在于说话者和会话是否是“真正(authentic)”的,而是如何作为“真货”被提示,即“真正化(authentication)”的过程(Bucholtz, 2003)。

多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分析“语言意识形态”,特别是标准语/非标准语的非对称价值是如何通过出场人物的发话(再)生产的这一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电影和电视剧等主要媒体的制作者通过让国籍、人种、性别、性取向、社会阶层各异的出场人物反复区分使用标准/非标准的语音、词汇、风格来区分团体,并给予出场人物特定的属性。比如,在迪士尼电影中,坏人有使用非标准的语音和风格的倾向(Lippi-Green, 1997)。关于这个领域的整体情况,请参见 Stamou (2014)。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语言与性别》出版之后的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只能介绍有限的几种研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了不起的研究。关于汉语的研究也已有很多令人兴致盎然的卓见。无论何种语言现象,要想充分探究都有必要将“性别”加入考察当中。如果我已向各位读者传达了这一点,那将庆幸之至。

中村桃子

2017年6月

于紫阳花烂漫的横滨

前 言

说到“语言”与“性别(gender)”的关系,也许大家会觉得非常难。然而,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语言与性别休戚相关。因此,思考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如同思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小事一样。比如,为何一直称呼自己为“ボク(我,boku)”的男生,有一天却突然开始称自己为“オレ(我,ore)”?有批评认为,中小学女生的谈吐“像男生”,那么导致她们出现这种语言行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女性在会议等公共场合发言时为何必须兼顾语言的“女性特点”和“观点的逻辑性”呢?男性朋友为何不像女性朋友那样“多嘴多舌”呢?上述情况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支配构造的影响,我们探寻语言与性别的关系,也是为了发现这一事实。

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的研究,有两大转折点。最初的转折点,当然是“性别(gender)”这一概念的出现。在“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出现之前,两者的关系并未被提及和重视。“性别(gender)”是女权主义提出的概念,目的是明确“性”具有社会侧面。此前,一般认为“性”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但是,“性”拥有社会建构、社会学习的侧面,这一点通过社会上那些表现出与生物学性别完全不同性别的人就可以明白。为了区分“生物学性别(sex)”,女权主义提出了“性别(gender)”(社会、文化方面的性别角色)这一概念,他们指出性别不仅包含生物学层面的含义,还包含社会层面的含义。〔“性别(gender)”被翻译成“女性性、男性性”“性别角色”等。〕近年,也有研究指出,不仅“性别(gender)”,就连生物学“性别(sex)”都是由社会建构的。“性别(gender)”概念容易让我们把从生物学方面看待的“性”,放在社会中探究它的历史形成。就这一点而言,它是一个跨时代的概念。

如果“性别(gender)”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它就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密不可分。如果现在性别(gender)的“差异”不是基于生物学的性别,那么这不是“事实”,而是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历史性建构的“意识形态(ideologie)”。无论哪个社会都存在“所谓女性/男性是指这种生物”这种与“性”相关的信念、知识和常识,这些

都是为了让男性的支配正当化而对男女进行区分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不应将“性”的差异作为生物学的事实加以接受,而是应将其视作“为了歧视的差异”来探究其结构。

第二个转折点是建构主义带来的。建构主义认为,“语言”不是抽象的“结构”,而是创造社会的“行为”。人们向来认为“语言”是我们传递信息或者想法的“工具”。既然是传达的工具,那么就拥有独立的“结构”,以往的语言研究也倾向于分析诸如“主语—谓语”这种抽象的语言结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明白,要想探究语言结构必须考虑使用语言的社会因素。如果不清楚是在何种情况下,谁对谁,基于何种目的使用语言的,那么就连“语言”的意思都无法解释。由此,也产生了以下视角:语言并非独立于社会的“结构”,而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行为”。“使用语言的行为(discourse)”不仅受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影响社会的社会性行为。“使用语言的行为”是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不应将语言仅仅视作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我们通过使用语言相互关联,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怎样的人,以及与对方的关系。这种视角,即通过“使用语言的行为”来建构身份和人际关系。“使用语言的行为”即便受缚于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拥有改变身份和人际关系能力的社会实践。

“建构主义”的出现使“语言”与“性别(gender)”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之前的研究,让“女人/男人”这两种性别与语言使用直接连接在一起,并将研究“女性和男性如何使用不同的措辞”作为研究课题。但是,通过“使用语言的行为”不仅可以建构彼此的身份,还可以建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有必要将“社会性别”作为通过“使用语言的行为”建构的身份,同时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加以理解。

新型“语言”与“性别(gender)”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三个视角进行思考。其一,将“性别”视作我们在相互关联中所建构的一种身份。我们试图通过使用语言的相互关联展现怎样的“女性”或“男性”呢?其二,将“性别”视作“使用语言的行为”历史性累积而成的意识形态。与“性”相关的意识形态是通过“有关性的语言”被建构的。“作为身份的性别”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性别”在“使用语言的行为”上相互交叉。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行为”中,参考“所谓女人/男人就是这种生物”的意识形态,通过接受或者反对的方式让其作为特定的“女人/男人”来展现。最后,将以上两个视角与社会的支配关系相结合。现有的“性别”关系是让女性接纳男性的支配。同时,这种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各种相互行为也与社会支配关系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行为”中,既可以依据意识形态建构“像女

人/男人”来稳固支配结构,也可以通过作为与此相背离的“女人/男人”而让支配结构发生改变。在变化的社会结构中,“语言”与“性别”通过“使用语言的行为”身份相互作用,在变化的过程中相互关联。

在此,我先陈述本书的书名与“语言与性别研究”领域各名称之间的关系。以语言与性别的关系为中心课题的系列研究一直以来名称各异。比如,“性别歧视与语言研究”“女权主义语言学”等。近年,随着“建构主义”带来的变化,“语言与性别研究”这个名称被固定下来。对于本书,我们采用“语言与性别研究”这个名称。这是因为,通过明确研究领域的名称,我们可以回顾研究历史,将整合过去各种领域的研究作为“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基础,并基于新的框架重新评价。此外,即便在尝试将新型“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理论化,以及吸收分散在各种领域的研究方面,“语言与性别研究”这个名称也是行之有效的。本书所使用的“语言与性别研究”,是一个基于语言学和女权主义理论,将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等相邻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此,并将“语言”与“性别”相关的研究进行整合、统括的名称。但是,现在“语言与性别研究”这个名称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确立,许多人对这个名称印象尚浅。因此,本书的书名为“语言与性别”,将追踪至今有关“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历史性轨迹,概说当前的理论,同时介绍最新的研究动向。

所谓“语言与性别研究”,就是通过“使用语言的行为”把我们自身作为怎样的女性或怎样的男性的研究。此时,社会中有关性别的意识形态如何作为资源被使用,或者因这些性别意识形态我们会受到何种制约?我们“使用语言的行为”如何被性别的权力关系所左右,或者如何变革权力关系?有关性别的形象、规范、范畴,是如何通过“使用语言的行为”来建构、正当化,进而被普及的?这些过程与社会结构有何关系?“语言与性别研究”所探究的就是上述令人兴味盎然的问题。

关于本领域的研究,虽然有许多英语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日语方面的少之又少。因此,“语言与性别研究”对语言研究与性别研究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这种认识在日本尚浅,且日本对这一领域也存在误解。

以本书为契机,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笔者也尽可能在书中对日语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但是,笔者个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有限,也许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研究。此外,迄今为止的“语言与性别研究”是基于英语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书选取的研究数据也偏向英语。围绕日语的相关研究,希望借其他机会再总结论述。

另外,在指出研究的问题点时,笔者引用了相关著作的一些例句,这些仅仅作为代表性例子被加以引用,没有任何批判例句作者的意图。

当然,全文引用的数据更具有意义。但是,因为本书主要在于尽可能多地提及相关的研究,所以限于篇幅不得不进行相应的省略和改写。对数据感兴趣的读者请务必阅读所引例句的原书或原文。

本书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序章,研究历史(第一、二、三、四章),后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受其影响的“语言与性别研究”框架概述(第五章),近年“语言与性别研究”的个案研究介绍(第六、七、八、九章)。

序章,从与女权主义的关联来探讨“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发展。之所以重视与女权主义的关联,是因为这个领域不仅是受女权主义影响发展起来的,而且今后也将与女权主义密不可分,这种关联可以使本研究跨越语言学的条条框框取得重大发展。

在序章的最后,我们概述了日语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历史。英语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历史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述,而在第四部分,我们将尽可能多地介绍日语的相关研究。

第一章,我们总结了被称为“语言与性别研究”经典的罗宾·莱考夫的《语言与女性的地位》和戴尔·斯彭德的《男性创造的语言》。这两本书广泛探讨了女性在使用语言时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今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两部作品中所指摘的问题,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金点子”。此外,对于两位作者的主张,也有学者进行了各种批判,此后的研究也是基于这些批判发展起来的。就这一点而言,了解批判的内容也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三、四章,我们选取了“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语言使用与性别研究”为研究对象。“语言与性别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说话者的性别如何影响语言使用”的“语言使用与性别研究”领域,它探究说话者的性别与措辞的关系;二是“性别表达研究”,它探究性别如何被语言所描述,特别是探究描述男女两性语言表达的不均等现象。两者遵循语言学中的“语言使用”和“语言体系”分别发展。但是,语言的体系随着语言的使用而发生变化,体系与使用密不可分。如第五章所述,今后两者的研究领域将在更大的框架中统合。关于“性别表达研究”的发展,请参见中村(1995a)的论述。

第二章,我们概述了基于拉波夫学派的社会语言学框架下的“性别差异研究”。当时主要研究说话者根据性别如何使用不同的语言,且主要以发音为主进

行了量化分析。但是,即便研究证明了女性的发音比男性标准,却未能解释其原因。因此,“性别差异研究”的整体框架遭到质疑。为何要将“性别”引入语言研究中?换言之,为何要探究“语言方面的性别差异”?它以怎样的“性别”观为前提?本书将以“本质主义的性别观”为关键点来解决“性别差异研究”的问题。如今,提及研究语言与性别的关系,势必会被问及“女性与男性的语言使用有何不同”的问题。这种问题设定作为语言研究是不贴切的,且会给女权主义运动带来弊端,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性别差异研究”之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发音到句子,再从句子延伸到对话、文本等话语,即使在“语言与性别研究”领域,话语与性别的关系也开始受到关注。在第三章,我们将话语分析分成异性间的会话和同性间的会话后进行研究。异性间的会话分析结果表明,男性遮蔽女性,“主宰”着会话。另一方面,同性间的会话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会话和男性的会话存在不同特征,这种差异体现在“女性采取合作的原则组织会话,而男性采取竞争的原则控制会话”。可以说,女性的会话成为研究对象这一事实进一步推动了“性别差异研究”。但是,同性间的会话分析并非要探究女性多样化的语言行为,而是将“合作性会话”一般化,这是问题所在。这表明“将女性视作均质团体,并强调其性别差异的倾向”根深蒂固。

第四章,我们概述了第三章中提到的由异性间会话分析发展而来的“支配模型”和基于同性间的分析而提出的“文化差异模型”。这两者基于两个相对的视角,即与“支配与否”的性别关系相关的两个视角。“文化差异模型”曾多次被痛批为“不考虑性别的支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意识到即使可以用“男性支配女性”这种支配关系来看待性别,也无法仅从“女性有别于男性”这种差异关系来对待支配关系。人们寻求更加动态的性别概念,将社会的支配结构与话语的关系纳入研究框架。

第五章,我们概述了“建构主义”的主张和观点。建构主义被全面引入“语言与性别研究”中,它在“语言使用行为”上重视“身份”和“权力关系”的建构过程。建构主义的观点与自古以来“语言与性别研究”主张的“性别决定说话方式”相悖,它让“不同的语言行为左右人们成为不同的男性和女性”这种视角成为可能。

第六、七、八、九章,我们探讨了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均为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的最新研究,它们包括“男性性”“媒体与女性性”“性取向”“作为意识形态的日语女性用语”。

除此之外,还有“妊娠、生产”(Talbot, 1998),“母性、父性”(Ochs et al.,

1995),“性暴力”(江原,1995a; Ehrlich, 1999),“消息媒体”(Carter et al., 1998),“年轻人用语”(《日本语学》1994年10月号)等有关语言与性别的各类研究,但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提及。

现在“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多。随着“语言使用行为”与社会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这一点被广泛认知,人们渴望包括日语在内的众多语言的研究。如果本书能成为此种研究拓展的契机,那将是笔者无上的光荣。

中村桃子

目 录

序 章 从女权主义看“语言与性别研究” / 001

- 一、诞生于女权主义的“语言与性别研究” / 001
- 二、从语言学类研究到与女权主义运动相关联的语言研究 / 003
- 三、日本的语言与性别研究 / 005

第一章 莱考夫与斯彭德遗留的课题 / 008

- 一、莱考夫的“女性的语言”概念 / 008
- 二、莱考夫指出的女性语言行为问题 / 009
- 三、对莱考夫的批判与之后的发展 / 010
- 四、斯彭德——女人的“沉默”与“疏离” / 013

第二章 何谓社会语言学中的“性别差异研究” / 017

- 一、社会语言学的“社会成层化”框架 / 017
- 二、证实女人比男人多用标准形的研究 / 018
- 三、为何女人比男人多用标准形——说明性别差异 / 019
- 四、社会成层化的问题所在 / 020
- 五、“性别差异研究”的根本问题所在——本质主义 / 022

第三章 话语分析——异性间与同性间的会话有何不同 / 028

- 一、何谓话语 / 028
- 二、异性间的会话——会话中的支配 / 029
- 三、同性间的会话——合作性会话与竞争性会话 / 031
- 四、对“合作性会话”与“竞争性会话”这种二分法的批判 / 037

第四章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三大模型——“支配模型”“文化差异模型”“劣质语言模型” / 039

一、何谓“支配模型” / 039

二、对“支配模型”的批判 / 040

三、何谓“文化差异模型” / 041

四、对“文化差异模型”的批判 / 043

五、“支配模型”“文化差异模型”“劣质语言模型”的共同问题 / 047

第五章 性别(gender)的建构 / 049

一、话语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049

二、话语与身份的关系 / 055

三、“性别身份”与“性别意识形态” / 060

四、对建构主义的批判 / 065

五、今后的“语言与性别研究” / 067

第六章 男性性的建构 / 070

一、多样的“男性性”与“主导型男性性” / 070

二、主导型男性性与从属型男性性 / 076

三、对性别关系变化的抵触 / 078

第七章 女性性、媒体、消费 / 083

一、作为消费者的女性性 / 083

二、媒体的话语 / 084

三、建构读者——序列型相互依存 / 088

四、不断制造性别类型的媒体话语 / 090

五、媒体话语中的创造性身份建构 / 093

第八章 性取向(sexuality) / 098

一、性向、嗜好 / 098

二、性欲望的建构 / 104

第九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日语“女性用语” / 110

一、作为性别意识形态的“女性用语” / 110

二、“女性用语”的历史性成立——“女性用语”概念的坚持 / 111

三、将“女性用语”规范正当化的话语变化 / 116

四、“女性用语”的政治功能 / 120

五、女性的话语实践与“女性用语” / 122

参考文献 / 124

索 引 / 146

后 记 / 153

译后记 / 155

简 介 / 157